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十七辑 • 新诗卷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十七辑·新诗卷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十七辑, 新诗卷/赵敏俐
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077 - 5127 - 7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新诗 - 诗歌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6020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 - 67601101 (营销部)、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赵敏俐

执行主编：孙晓娅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编 务：马富丽

目 录

青年学者沙龙

“诗歌——冲破界限和语际的错置”讲座

交流会录音整理 ◇整理者：田伊/1

论文索引

2014 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 ◇李秀荣/14

2015 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 ◇许敏霏/92

诗集与诗学论著叙录

新诗著作书目（2013—2014） ◇刘福春/172

专题：慕白诗歌研究

诗与感觉的命运

——慕白诗集《行者》中的三种生命诗化形式 ◇薛梅/242

旷达之意与远观之美

——由诗集《行者》论慕白诗歌 ◇刘波/251

“行者”物语

——慕白诗歌的“慢哲学”思维镜像论 ◇陆健 朱林国/258

慕白论

——以《行者》为个案 ◇孙榕璐 张立群/265

行者，在路上

——读慕白诗集《行者》 ◇王永/274

目

录

书 评

“多种声音的奇妙混合”

——《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推介

◇洪子诚 ◇张清华 ◇罗振亚/284

体验、对话与仰望

——读《冯至评传》 ◇刘 剑/290

“现代汉诗”是如何发生的?

——读荣光启《“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 ◇刘 奎/300

建构中的新诗地理学图景

——评张立群《新诗地理学》 ◇孙 佳/305

学术会议综述

诗人与时代同在

——“张志民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许敏霏/309

孙绍振诗学思想研讨会综述 ◇王炳中/315

“纪念新诗诞生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

研讨会”综述 ◇许敏霏/320

于明诠诗歌创作与书法艺术研讨会

录音整理 ◇整理者：庄绪成 贺嘉钰/328

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王 翠/363

“穆旦与百年中国新诗：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九届

研讨会”综述 ◇卢 楷/370

学术会议与活动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慕白诗歌创作研讨会

在京召开 ◇晓 芒/377

首都师范大学第十二位驻校诗人冯娜入校仪式

在京举行 ◇郭建超/378

《张枣译诗》发布暨研讨会在首都师范

大学召开 ◇吴 昊 张凯成/379

日本著名诗人、女性学批评家水田宗子在首师大

举行讲座 ◇周素子/380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冯娜对话会在京举行 ◇李 扬/382

“诗的互文性”对话交流会在京举行 ◇李 扬/383

“诗歌——冲破界限和语际的错置”讲座 交流会录音整理

主持 人：[马其顿] 尼古拉·马兹洛夫 (Nikola Madzirov)

翻 译：胡续东、西 川（马兹洛夫的发言无特殊标注的均为胡续东翻译）

主 持 人：孙晓娅

整 理 者：田 伊

时 间：2015 年 11 月 19 日

地 点：首都师范大学

孙晓娅：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尼古拉·马兹洛夫。他是诗人、散文家、译者。他 1973 年生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斯洛文尼亚诗人萨拉蒙和波兰的扎加耶夫斯基对他都有十分中肯的评价，把他看成是中东欧诗歌的接班人，也是后苏联时期非常优秀的诗人。德国《明镜》周刊 (*Der Spiegel*) 甚至将马兹洛夫和特朗斯特罗姆相提并论。

今天的活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主讲人尼古拉·马兹洛夫做主题报告；第二部分是尼古拉和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们的对话；第三部分是尼古拉·马兹洛夫作品的朗诵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首先我们用掌声欢迎来自马其顿的诗人尼古拉·马兹洛夫。今天我们还请来了北京大学的胡续东教授担任翻译。到场的嘉宾有：西川、王家新、树才、罗德炜、西渡、蓝蓝、潇潇、安琪、爱斐儿、张光昕、罗伯特 (Robert Tsaturyan)。

尼古拉：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到北京。我们刚才还在交谈，很多诗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作品先来到某处，随后诗人本人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作品来到这里。首先感谢孙晓娅老师的邀请，感谢今天莅临的各位诗人、朋友，我很珍视各位的诗人兼译者的身份。我今天想谈一些关于生活和写作的隐喻化问题，还有我们改变我们的时间和空

间的驱动力、生命本能的问题，也会笼统地谈到其他与诗歌有关的话题。

我来自巴尔干半岛，祖先是战争难民，我前些年才得知自己的姓氏“马兹洛夫”（Madzirov）这个词来自于阿拉伯语，意为“漂泊的人、无根的人”。接下来我想和各位分享我的报告《语言和诗歌的沉默边界》。

带着每一个写就的词语，我出发前去寻找遗失的沉默，寻找在女人分娩的哭喊和婴儿的啼哭之间、在作家的不确定性和政客的言之凿凿之间、在寺庙里的祈祷和寺庙门槛上的疑问之间的寂静。或许出于对词语里疼痛的真理的恐惧，真真假假的先知们用诗歌书写他们的预言。在安全墙的后面，诗歌已经祛除了伟大叙事的神秘感，并使得官方历史和民族界定的层级制发生了变形。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今天的“全球共和国”的区别在于，在柏拉图的时代诗人被逐出了社会权力领域，而今天，正是诗人在尝试把国家逐出他自身。关于距离的现代美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每一次旅行都关涉到与我童年语言的距离，让我一直保持活力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诗歌安静地反抗着所有强化了民族和历史先决性的理论。在诗歌中，仍有无须杀戮就可征服的空间。与此相反，自从科学标注出世界地图上的每一个脚步，人类的本性就开始无情地撕毁当前方位和身份的羊皮书，去征服能征服的一切，并同时以逝者和未出生者的名义许诺和杀戮。每个入侵者的目标首先是擦除记忆。甚至连河流的河段也被重新命名——同一条河流在穿过边界时从一个名字流向另一个名字。这是在地图集的同一页上，以重命名而不是页码替换的方式，对身份进行翻译。军事命令是最难翻译的，因为它们只会被它们的喧响所铭记。它们的确不需要让人知道含义就可以杀戮。

我们该不该相信权力的传声筒传出来的被修改过的诗歌的声音？诗歌能否成为飘扬的旗帜上看得见的风？在大自然中，宝石不会以单体的形式出现，然而诗人被认为是绝无仅有的孤独的种类，是他们自身的恐惧和渴望的密钥持有者。在过去，他们被认为是帝王的良心（或耻辱），而后又被认为是人民的……当他们写下永恒，写下被种植到信仰的花盆里的身份时，他们往往被加冕。今天，这一切都由媒体来承担了。然而，在一些国家，你依然能够听到人们像这样招呼着诗人们：“诗歌万岁！革命万岁！”1941年，苏联的一份报纸在头版刊发

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挽歌《等着我》，诗句“等着我，我会回来，但请耐心等待”像祈祷词一样在成千上万年轻的苏联士兵口中传诵，他们正用肉身筑起法西斯不可逾越的边界。如果不和那种继承下来的归属意识保持距离，诗歌可能仍然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参考指标，其中承载着明确的行政边界之内全能的神话。我相信疆界和诗歌的演变，相信他人的记忆里那个转瞬即逝的世界，相信一个人未完成的马赛克留下的考古学意义上的在场。我奋力寻找着每一个至少能让我离沉默、离那种与“缺席的本质”截然相反的“本质的缺席”更接近一点的词语。我想要属于世界，因为我不想世界属于我。我没有在梦中描画或者涂在脸上的旗帜。当我书写逃离时，我不想眼望窗外；当我谈论成熟时，我不想从家庭相册里取出一张照片；当我说到“非战”时，我不想变成一个士兵。

柏林墙倒塌之后，某种界限分明的美学的砌石也随之垮塌。我开始意识到词语的易损性，以及它们在强制阅读的教科书之外的活力。波兰诗人塔德乌什·鲁热维奇（Tadeusz Różewicz）在一首名为《未知字符》的诗中，提到当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靠近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如何覆盖并永久擦除了他用手指写在地面上的字。就连从未写下任何东西的他，也深知词语的暗示性力量。我并没有幻觉般地认为自己在讲什么新鲜东西。比起战争的秘密，我更相信藏起来的玩具。有时候，为了写作，一个人有必要置身于孤独之中，这孤独带来的恐惧和记忆不会比死亡更多。回想你刚做的梦的最妥帖的方式，是你醒来之后不要往窗外看。我是一个战争移民的后裔，我四处迁徙不是要去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而是源于存在的迫切需求。因此我并不清楚什么是更好或者更糟——我只能说，什么是更远的。我相信复述的迫切需求仍将存在，因为离开和返回的神秘感依然存在，悲痛依然是生存的一种普遍状态——在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土地上悲痛只是一种回答，它并不意味着软弱。

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沉默空间，在巴尔干半岛上，人们往往在边界上保持沉默。有时候，是出于对历史的恐惧，有的时候是源于对古老的文化遗存的敬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沉默的美学》中罗列了那些以极为不同寻常的方式归于沉默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兰波前往阿比西尼亚，试图在奴隶贸易中大发横财；维特根斯坦一开始选择去做一名医院护理员；杜尚转而迷上下棋。我经常问我自

己，翻译只是一种保持沉默或者转移沉默的方式吗？它或许是在不属于我的住所和语言之间安静地穿行的唯一方式。

翻译是与被遗弃的词语们进行生动的对话——在一个新的文学家园中复活它们易碎的身份。阅读本质上是一种翻译，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写作，写作本质上是对词语的遗弃。当某人去世的时候，我们说他离开我们了，就好像我们承认逝去的人是离开这一行为的施动者，而我们不过是满怀恐惧的活着的观察者而已。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战争和灭绝之后，害怕被留下来的恐惧感在我身上越来越强烈，我发展出了一种迅速埋葬我所拥有之物的迫切需求，而不是把它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翻译帮助我认识到，转移也是一种贮藏，它是一种安顿下来之前的离开，而不是相反。如果批评是被另一支蜡烛点燃的蜡烛，那么翻译就是让烛火能够持久燃烧的氧气。有时候，词语会在新的语言领地里迷失自己，就像一个过于好奇的孩子在一扇扇敞开的大门之间迷了路。回家的愿望，也就是去看熟悉的画面、去听熟悉的意思，在翻译和返乡这两种行为中都是成倍出现的。翻译就是让词语返回到沉默中，并让它们重生于另一种环境。由于缺少会说马其顿语的翻译，每次我出示护照、每次我穿越我“继承来的安全感”的边界的时候，都不得不说法语。我的母语因而得以仅仅被保留为我的写作语言，远离各种持存的身份。米沃什和维特根斯坦都说过语言是家园或者故乡，但就我的情况而言，诗歌已成为我的语言的唯一故土。

我的发言就是这样，希望接下来就写作和翻译的问题与在座的朋友们展开对话交流。

孙晓娅：马兹洛夫的主题发言与我们分享了他的翻译和诗歌语言观，以及其四海为家的迁徙流浪方式。接下来，希望大家就他谈到的话题，或者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互动对话。

王家新：我想了解一下我们手上这份译诗，译者是从马其顿文翻译的，还是从英文转译的？

尼古拉：可以确定的是有一个译者会马其顿语，她住在香港，但是从译文看第一个译者的翻译应该是建立在英文的基础上，然后再请那位马其顿译者对照着马其顿语进行校对的。一般情况下，翻译都用英语作为桥梁语言、校对语言，但是这次情况特殊，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之后用马其顿语的作品作为参照译本。

我也考虑过用英语来写诗，但是转念一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对我来说这么不自然，背离了母语的书写状态，这种差别太大了。布罗茨基也通英语，但仍坚持用俄文写作。

王家新：我不懂你的原文，也没看到英译，读这个译本感觉还可以，但缺乏生气，也无法从中听出你的音调。

尼古拉：我猜测是因为翻译的过程中缺少诗人的触摸。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在一次对话中提到，翻译其实是天才之间的一种合作，在好的翻译里，一个作者需要一个与其心智状况均等的译者。幸运的是，我的英译本的出版编辑在美国，他本身是一位诗人。另外，德语、西班牙语译本的译者也都是诗人，所以翻译出来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说好。希望能有汉语诗人的加盟，让我的作品在中文中也火起来。我十分感谢我的译者！

在上海，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诗歌被汉语朗诵出来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奇怪的感受，仿佛这些诗回到中文里一样，尽管我从没在汉语的语境中生活过，尽管我也读了很多被译介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当代诗歌，甚至包括今天在座的一些诗人的作品。因此，我以为“回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契机，可以由此开启和中国诗人进行对话。

西川：你不需要担心你的诗歌翻译出来是什么效果，因为从刚才我看到的你的诗歌译文中，我依然可以感觉到诗意和你写作的分量。能找到好的译者，像合作伙伴一样的译者非常难得，也比较罕见，但我这里引用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好的文学可以打败糟糕的翻译。布罗茨基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每当我学会一种新的语言的时候，我都会被我诗歌翻译成这种语言的样子吓一大跳。

蓝蓝：尼古拉虽然四海为家，但现在在哪里居住生活呢？

尼古拉：虽然之前我四处漂泊，体会如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所说的“你想要生活在你不懂其语言之所在”的那种特殊的孤独感，不过我现在回到家乡了，一个只有4万人的小城镇。明年我会去巴黎和柏林居住，又是和自己语言不通的地方。

蓝蓝：我十分关注尼古拉现在的身份对其写作的影响，尤其是前些天巴黎发生那样一件事情^①，而且这几年连续不断地发生暴力的民族的、宗教的冲突事件，这些都是大事，还有小事，小到我们日常生活

^① 这里指的是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中与亲人朋友之间发生的善与恶的冲突。我在想一个诗人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尼古拉：2001年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受邀去马其顿参加“斯特鲁加诗歌之夜”，刚好那一年马其顿爆发内战。大家都担心希尼不会去了，然而他来了，并且就在开幕仪式的现场依然可以听到子弹呼啸声。当他被问到“你感觉如何”时，希尼回答说，“就好像回到我自己家一样”。

至于我，我是一个经常在边界游走、在壁垒边缘徘徊的人，从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变成另一个国家（马其顿）的人，从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走向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不停在各种冲突尖锐的身份的边界来来回回。所有这些因素都塑造着我的身份，可以说，在我这里，最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身份的不确定性。并且我深切地感觉这种游走于各种边界的情形与卡夫卡的经历相类似，就像是生存的迫切要求。也许这就是我相信诗歌的原因。我也曾到各地去参加各种活动，有一次在伊拉克战争严峻的时候去巴格达，体会到诗歌在那样的状况下的出现。我个人认为诗歌本身没有道德价值，但写诗是一件具有道德意味的事情。

前南斯拉夫诗人查尔斯·斯米克（Charles Simic）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到美国去了，后来有人问他，是作为战争难民的经历使你成为诗人的吗？他十分睿智地回答说，不是这样的经历使我成了诗人，而是这样的经历使我成了这样的诗人。所以漂泊的方式对我而言至关重要。

我们能想象出没有保罗·策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吗？还有 Miklós Radnóti 这位匈牙利诗人，他本来诗名不盛，直到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他写下的动人诗篇，不久后把它们发表出来，又被翻译，广泛传播。通过他写在明信片上的诗歌我们才更多地了解到集中营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些诗篇发出的声音与历史相应和，警示着我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不仅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就在今天，就在我的家乡附近，萨拉热窝也发生了恐怖袭击，已经有两个士兵牺牲了，更多的情况还不清楚。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你看，我们其实活在另一个欧洲。战争中武器的语言带着它们的强度，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语言来对抗。新的一期《查理周刊》上有个漫画不知你们看过没有，画上是一个法国人喝着香槟，但他肚子上都是孔，酒就从中飙出来。他却说，你们

的子弹可以打穿我，但去你妈的，我有我的香槟。

在巴尔干半岛，语言的暴力问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而且情况具有特殊性。巴尔干半岛上很多语言都属于斯拉夫语族，其实很相近，关键在于你怎么发音。发音不同有时候决定彼此是朋友还是敌人，如果在战争中，可能就是同一个词，但由于你的发音方式不同，人家就会把你干掉。斯洛文尼亚的著名哲学家希德克也以斯洛文尼亚和巴尔干地区的情况为例，谈过有关语言暴力的问题。

有一个波黑人，作为战争发动者，既是独裁者又是诗人，他找了一批诗人来颂扬他的战争的合法性。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有很多人会通过媒体宣布拥有权力，同时又通过显示出他热爱诗歌的一面以证明自己还有良心。我非常喜欢像策兰这样的诗人的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让人无法遗忘。诗歌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即使你对一首诗写作的背景一无所知，但是读的时候还依然为之一振。

王家新：虽然我们手里这份译文还不甚完美，但这些诗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谈到的在当今这个社会，如何辨认我们自己的身份的问题，关于语言暴力和冲突的问题，是我十分赞同的。接下来我想谈一些和翻译有关的。刚才你谈到你的母语是一个大约 200 万人使用的小语种，你有一种困境之中的危机感，比如你说到每次跨越边境的时候都必须使用英文，而马其顿语作为支持你写作的语言是唯一的家园，其实中国诗人也是这样。虽然讲汉语的人十几亿，汉语是大语种、超级语种，但是我们用英语依然是一样的。我一直不赞同把一个诗人的生命固定化。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是我们作为当代诗人，新的身份是创造出来的。我特别欣赏一句诗“为了杜甫，我们必须成为卡夫卡”。卡夫卡作为一个犹太裔德语作家，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回家”。我一去布拉格马上就想到这句话。问题在于，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的家在哪里？这个问题需要通过我们一生的写作来回答。所以我们需要重视翻译。你刚才谈到翻译是保留，是转移，在我看来还不仅如此：翻译不仅是一种保留，还创造另一种语言、另一个自己，或者说自己的另一个声音。我们不可能通过翻译原样保留什么，翻译就是一直在变化、在创造。比如说，有人用创造性的方式来翻译我的诗，如果翻译得好，我完全赞赏，绝不会说你的翻译是错的，译者有这样的权利。我们翻译其他语言的作品，同样也可以给自己的语言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元素。我非常赞赏

庞德的一句话：“翻译会教给你你自己的语言。”所以翻译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奥秘需要慢慢体会。汉语虽然有深厚的传统，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仍有待发现，有待借助外来的冲击激活它——我们用来写作的母语。你刚才谈到保罗·策兰，我也是策兰的中文译者之一。我为什么翻译策兰？就是因为我看重他的诗歌带来的语言的冲击和刺激。普鲁斯特曾经讲过，“伟大的作品看起来好像是用外语写的”。对于诗人来说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对待自己的母语应该像对待外语一样。

尼古拉：谈到这个问题我很开心，并且十分赞同这种“翻译是发现、创造另一种声音、语言”的表述。我常有一种强烈的意识，通过翻译来寻找另一种至关重要的、更接近沉默的语言。有时我担心翻译的时候不是在写作，但也许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隐藏了我自己，面对了我自己。以前我不太理解瓦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所谓的“通过重复，在翻译中保留一种语言的原创性”这种说法的奥秘，但后来我体会到这种重复不是简单的“再说一遍”，从某种程度上说，重复意味着创造。

树才：初读你的诗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你的诗歌是第一次被介绍到汉语中，而且你的译者也不是我喜欢的诗人，甚至不是大陆人，但我认为这个翻译整体来说是好的，因为诗歌的整体气息和声音都能从中辨认出来。有些译句被创造得很好，比如“蜘蛛网缝合墙壁”，我感觉谁也无法把这句翻译得更好了。家新刚才提到的是翻译的最高要求，是理想化的状态。如果真的要探讨诗歌翻译，我认为诗人必须用母语表达，译者也必须在场。离开母语探讨翻译，有些像半空中的对话。英语对你来说是副语，这些诗也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不再具备特别的滋生能力，但考虑到这是你的诗第一次被翻译成汉语，基本上算是成功的。而且这一次主要是你亲自来到中国，不管是现在还是之前在成都或深圳，大家能在安静的氛围中感受诗歌——无论是你听到诗人们在现场朗读你的诗歌译文，还是你朗诵你的诗歌，这种直接的接触是最好的。

胡续东：刚才树才说也许以后会遇到家新提到的理想译者，尼古拉回应说也许他死了以后就碰到一个。

尼古拉：我不懂汉语，在座的朋友又不懂马其顿语，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只能采用中立的语言来谈论诗歌。也许我们以为依靠中间语

的方式是安全的，但这也会带来致命的恶果，这情形就好比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打仗的时候，波斯尼亚是它们的中间地带，没想到战争的结果是把中间地带彻底摧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第三方语言，也就是英语，因为通过它，我才触摸到汉语诗歌。刚才西川跟我交流的时候，我们发现彼此都很喜欢对方所写的关于雪的诗，甚至不曾见面，我们就已经达成了这种默契。

西渡：如树才所说，我也同意这个译文是很不错的。通过这个翻译，我能感受到马兹洛夫是一个有冲击力、有分量的诗人。虽然家新刚才说他听不出原诗作者的语调，但我认为这个译文本身有稳定的语调，它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之前几位译者对于诗歌都有敏感的感受力，不知我的感受是否准确，我读后感觉是沉重的，也许是北京今天的坏天气影响了我的判断。在我看来，马兹洛夫诗歌的一个宝贵之处在于他特别善于处理看似日常的、普通的事物，他重新照亮了这些普通的主题。这种能力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非常重要。举个例子来说，面对本身富有诗意的东西，比如梅花，中国诗人拿它入诗处理起来得心应手，但是如何把土豆也写得有诗意，这就体现能力了。我看到有人把他和特朗斯特罗姆相提并论，我本人还是喜欢马兹洛夫的诗。

马兹洛夫：谢谢你。德国的《明镜》周刊 (*Der Spiegel*) 做了这样的比较，也许是因为他们看到特朗斯特罗姆的创作中也提到“有色彩的记忆”“移动的阴影”之类，也可能我们创作的诗歌的神韵有相近之处，但诗学观还是不同的。

西渡：特朗斯特罗姆处理的题材是更富有诗意的，但在汉语中，从中国古典的、当代的诗歌中来看并没显得特别有新意或创造性。

马兹洛夫：对欧洲人来说，他的创作很独特，甚至通过把诺贝尔奖颁给他来宣告欧洲现代主义的终结。

西渡：马兹洛夫的诗给我带来了一种看待事物、看待世界的新方式。

马兹洛夫：非常感谢。奇怪的是，尽管我们相离甚远又素未谋面，却感觉如此贴近。甚至当我读到在座朋友们的一些诗歌时，都很有认同感，仿佛我们在讲同一种语言，也许这正是诗歌本身的力量所在吧。

安琪：因为最近发生在巴黎的事情，微信上很多文章都在讨论欧洲的问题，其中有人提出欧洲最后会被穆斯林统一。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的《在我们出生之前》这首诗的第二节写到“欧洲正在统一”，请问

你当时是什么想法？

马兹洛夫：就地理意义、地缘政治而言，如果你看欧洲地图，会发现在那些不属于欧盟的国家，穆斯林占很高的人口比例。你看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科索沃……科索沃有90%的穆斯林。但我们平时只注意到另外那半个欧洲，而那个欧洲有意地以一个隐蔽的帘幕（就像以前铁幕时代的铁幕似的，只是这个比较隐秘）把这些穆斯林人口很多的国家挡在欧盟旗号之外。近年来发生的，尤其是这一次的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无疑使得整个事态更敏感了。我确信一些欧盟国家现在有充分理由关闭边境线。

我的这首诗被刊登在德国的一家日报上，我很不理解，于是就给我的出版商打电话，问他我的诗歌怎么会被搞到日报上发表？他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首政治诗。看吧，只是因为这首诗是个来自巴尔干地区的诗人写的，它就有政治性，而这如果是个法国人写的，就不算是什么政治诗了。

王家新：翻译也许有差异。

安琪：不知道你写下“欧洲正在统一”这句话的时候原本的意图是什么，是从语言方面还是政治等其他方面考虑的呢？

马兹洛夫：我写这句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欧盟”这个概念。实际上，即使在欧盟这个概念形成之前，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甚至卡夫卡等许多作家就已经在谈论“（整体的）欧洲”，他们寻找一个摆脱国籍的囚笼、冲破民族主义的藩篱的方式。后来才有了欧共体这个经济意义上的联合，然后有了政治意义上的欧盟。而奇怪之处在于，当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席卷而来，人们就忘记了所谓欧盟的形成其实是滞后于文化、艺术、诗学观的。并且也许这会带来新的文化身份认知的变化。

王家新：这里中文翻译是“欧洲正在统一”，而在英文中是过去进行时。而且这首诗的“少女”在英文的译文里是“woman”（妇女），这差别挺大的。

马兹洛夫：这个问题确实有探讨的必要，因为过去时这个时态是很重要的。尽管马其顿花了好多年时间与欧盟进行谈判，然而我的国家直到现在都不属于欧盟，只是属于巴尔干地区。有时候说自己来自巴尔干地区会因为别人恶意的联想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以前我

去美国的时候就说我从马其顿来，美国人都不知道马其顿是什么，我只好说 I come from Europe，他们倒也乐于接受。而更诡异的是，我到欧洲其他国家去，竟然还要向他们申辩自己来自欧洲！我们分明在欧洲地图上，可欧洲人才不这么想。如果你问一个荷兰人，捷克和葡萄牙哪个离你们更近？他大概下意识地会说葡萄牙。欧洲人管我们叫东欧，这跟马其顿是否真的在东边无关（事实上马其顿的地理位置处在南欧），这些“东”“西”的指称无关乎地理方位，只是出于理念的建构。要知道欧洲人是通过美国才读到 20 世纪塞尔维亚最伟大的诗人瓦斯科·波帕（Vasko Popa）的诗歌的！虽然诗人一辈子都在欧洲，没去过美国，但他的诗通过斯米克在美国翻译出来之后，欧洲人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个诗人。

王家新：萨拉蒙、扎加耶夫斯基也都是在美国出名的。

西川：第一个问题，似乎来自巴尔干地区，或者所谓的“东欧”诗人们有独特的共性，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诗人们，或者说至少和另一半欧洲诗人不同的一些特质。扎加耶夫斯基、萨拉蒙、斯米克、波帕、米沃什等等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诗人群，而中国读者现在对东欧诗人的创作越来越熟悉，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第二个问题是，一方面你认为美国人、西欧人都不够了解马其顿，你总需要澄清自己、介绍自己，但另一方面，似乎你和其他诗人们又确信彼此间存在共性，这中间是否存在矛盾？

马兹洛夫：也许和斯拉夫神话这个共同的语境有关，泛斯拉夫主义统摄之下产生了巨大的斯拉夫帝国，北到俄罗斯，南到马其顿（也就是前南斯拉夫最南的边界）。这种共同性一直很强烈，但是有很多作家却不肯相信这种共识存在，比如米沃什、昆德拉。这些诗人都拥有“跑路”^①的冲动，想寻找一个新的空间、新的起点。因为国家对他们而言是筑起的高墙，即使跑出来，腿上依然有被束缚感，然而越有禁锢感，越让人产生跑开的欲望。有时候发现波罗的海周围的国家有好的诗人出现，可一细究其背景发现也有东欧的印迹，比如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东欧的跑路精神里隐藏着一种新的变形记，他们从小就有要不停地置换自己的意识，包括空间的置换还有通过写作进行的精神置换。只要跑出去就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一种空间的壮大感。以前

^① 这里王家新认为应该翻译成“跑开”。